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 正确理解政绩观：是什么，为什么

长江日报记者刘功虎



岳奎 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 造福为民，不谋个人声名

**求知：**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词汇，“政绩”在古代有着怎样的内涵？

**岳奎：**政绩，直白来说就是指为施政所取得的成效。这个词最早在我国历史典籍《后汉书》中就已出现。

古代人们尤其士人团体看待“政绩”，并非一个简单的概念，而是一个融合了道德操守、民生关怀、个人修养与历史担当的复杂价值体系。它既是国家制度对官员的硬性要求，也是很多士人内心自觉的精神追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了给世人和后世留下一个好名声、好官声，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不少官员都曾取得修水利、劝农桑、办学堂等诸多方面的政绩。政绩观，可以说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

但要看到，纵观历朝历代，官员作为专制统治的代表，他们所追求的政绩本质在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所谓“民为贵，君为轻”等“爱民”“护民”思想，实则是在不改变封建生产关系、不触动地主阶级利益根本的前提下，对社会矛盾进行周期性修复所提出的口号，目的仍然是“治民”“牧民”“防民”。在实现方式上，古代政绩的创造高度依赖官员个人的道德修养和才能。与此同时，政绩考核标准的导向性进一步强化了官员对“显性”政绩的投入力度。因此习近平同志早在福建宁德工作时就强调指出：“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上，帝王将相何其多，但在百姓头脑中留下记忆的也不过百来号人。”

**求知：**我们所倡导的新时代政绩观，相较于古代实现了怎样的超越与进步？

**岳奎：**新时代政绩观与古代所说政绩，有着本质差异，这源于生产方式与阶级立场的根本不同。正如马克思主义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政绩观的形成必然受制于特定的经济基础与历史语境。古代政绩观植根于封建土地所有制与小农经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限制了政绩观内涵的深化与外延的拓展，使官员不得不将“增户口、垦荒田、征赋税”等内容作为衡量政绩的重要指标，而将维护封建生产秩序与修复短期社会矛盾作为其主要政绩追求。

与之根本不同，新时代政绩观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它不仅涵盖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全方位追求，更蕴含对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不懈努力。树立和践行新时代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而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因此，中国共产党人的政绩观必然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绩观，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造福的政绩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业绩好不好，要看群众实际感受，由群众来评判。”新时代，人民不仅是政绩的享有者，更是政绩的评判者。

在实现方式上，新时代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它一方面强调“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另一方面注重运用系统思维，处理好“显绩”与“潜绩”的关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既要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作为后人作铺垫、打基础、利长远的好事”。

## “成绩斐然”，也不一定是政绩

**求知：**政绩与工作成绩是不是一回事？

**岳奎：**工作成绩与政绩，看似一体两面、难以分割，实则有着本质差别。工作成绩是个体或群体履行岗位职责、完成具体任务所取得的实际成果，是对具体工作成效的客观呈现。政绩则特指党员干部在履职过程中，围绕区域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等全局性、战略性事业所创造的综合成效，承载着造福于民的使命担当。它是一个更具政治高度、价值深度和实践广度的范畴。因此，政绩表现为一系列具体的工作成绩，而非所有工作成绩都能自然而然地升华为政绩。

首先，工作成绩具有普遍性，涵盖所有从业者在履职过程中创造的所有可量化、可衡量的具体成果。而政绩则具有强烈的政治属性，是党员干部工作成绩中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那一部分。一项工作，即便在业务指标上成绩斐然，但若在政治方向上存在偏差，或损害了整体利益与工作全局，则绝不能称之为政绩。

其次，政绩以“人民至上”为根本价值尺度，而工作成绩则只聚焦于完成任务、提升效能。对工作成绩的衡量，往往聚焦

于具体内容的落实情况与实际成效，而较少涉及公共利益、长远发展等全局层面的考量。其评价多局限于个体岗位与具体业务，最终体现为数据增长、工程竣工等客观结果。而政绩必须真正符合人民利益和客观规律，必须是对群众需求的精准回应，必须在实际中增进了人民福祉、促进了共同富裕、得到了群众认同。如果一项成绩只有数字堆砌或外表光鲜，而未获得群众认同，那么它只能是工作成绩，而非政绩。

**求知：**区分政绩与成绩的关键是什么？

**岳奎：**一般的工作成绩可能不称其为政绩，但政绩一定是实实在在地、福泽人民和后世的成绩。政绩是显绩与潜绩的辩证统一，是短期与长期、当下与长远、身前与身后的有机统一。

工作成绩往往是短期的、局部的，反映单一工作完成质量与效果的，不涉及全局统筹与长远发展的成效。成绩也往往是看得见、摸得着、立竿见影的结果。而政绩必须尊重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经得起科学追问和长远打量，既珍视当下可观可感的成果，更鼓励和表彰那些周期长、见效慢，但为未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积蓄长久优势的努力。归根结底，政绩是政治性、人民性、历史性高度统一的工作成绩，比取得一般的工作成绩要求有更高的政治站位、更深的为民情怀、更强的全局观念和更远的历史眼光。

## 政绩以公心为本，政绩工程因私欲异化

**求知：**政绩与政绩工程又是怎样的关系？

**岳奎：**这两者的区别可太大了。

它们都有“政绩”二字，根本上却是对立的，水火不容。政绩是党员干部在推动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公平正义等方面履职尽责取得的实际成效，是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现实成果，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而政绩工程则是指少数领导干部在错误政绩观指导下为追求个人声誉、实现职务晋升或获取政治资本实施的脱离实际、劳民伤财、华而不实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样板工程。本质上，它是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施政行为上的集中体现。一言以蔽之，政绩与政绩工程，看似同源，实则殊途，前者以公心为本，以务实为径；后者以私欲为驱，以务虚为表。

从动机与立场看，政绩来源于党员干部对初心使命的坚守。它紧盯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重点领域，始终将群众的获得感与满意度作为衡量成效的最终标准。真正的政绩，不显于一时一事，而在于为公、为民、为长远。秉持正确政绩观的干部，始终以地方发展为使命，以民生福祉为追求，以公共利益为归依。他们坚持对工作负责、对历史负责、对群众负责，在决策与干事创业中，不囿于个人得失的算计，不留恋短期出彩的浮华。而政绩工程源于个人私欲驱动，瞄准的是个人的升迁捷径，期盼的是一时的官场名声。因此，政绩工程往往脱离实际贪大贪多、弄虚作假，盲目追求各种头衔，热衷攀比各类榜首。它可能是某些干部为自己铺路的“垫脚石”或向上攀爬的“敲门砖”，而唯独不是为人民服务的“民心碑”。

从过程与结果看，政绩来源于党员干部对客观规律的把握与遵守，是党员干部在履职过程中，立足地方实际、遵循发展规律、紧扣民生需求，通过真抓实干、科学决策所取得的实实在在的方面成果。它坚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不搞虚浮造势，不做表面文章，既注重当下可见的成效，更兼顾发展的长期效益。而政绩工程则产生于部分干部对客观规律、地方实际以及群众承受能力的漠视与违背。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就是政绩工程的突出表现。因此，它往往造成资源浪费、财政负担加重、债务风险累积的后果。政绩工程看似场面宏大、形象亮眼，却无法解决实际问题，难以惠及普通群众，甚至损害群众利益、破坏生态环境、透支政府公信力，致使群众力量涣散、信任流失，对地方发展造成长远负面影响。其要害，就在于急功近利、好大喜功。

**求知：**我们如何对待“政绩工程”？

**岳奎：**首先必须铲除政绩工程的土壤。始终坚持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深化正确政绩观教育，引导干部重实干、重实绩、重长远，不图虚名、不务虚功，让“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融入血脉。其次必须完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让“潜绩”与“显绩”同考，“民意”与“官评”同在，让搞政绩工程的干部没市场、受惩戒，让真正政绩的党员有舞台、受褒奖，从源头上扭转急功近利、重“显绩”轻“潜绩”的错误导向。再就是必须强化全过程监督和严肃问责、终身追责制度，推进项目、资金、过程全公开，引导党员干部树立“做事”而非“作秀”、“造福”而非“造势”的务实导向，确保一切工作都奔着解决实际问题去，朝着惠民实效去。

武汉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全力打造“五个中心”，其中之一是打造区域金融中心。其核心思路在于，通过构筑特色金融优势，实现金融与科技、信息等深度融合的深度融合。这不仅事关城市能级的跃升，更是服务国家战略、迈向未来竞争的重要一环。

## 明确核心定位：从“节点”走向“枢纽”

城市的金融地位，取决于其在金融网络中的枢纽程度。伦敦、东京、中国香港等国际大都市，无一不是全球重要的金融中心。武汉要建成区域金融中心，不能只做全国网络中的一个普通“节点”，必须成为不可替代的关键“枢纽”。这就要求武汉跳出传统路径，瞄准科技金融、碳金融、数据金融等细分赛道，打造特色金融高地，从而掌握资源配置的主动权。

同时，要以未来城市的视角来谋划金融业发展。随着科技进步和智能化水平提升，未来城市将呈现截然不同的面貌。上海联合国大基金数万亿级基金，注重人工智能领域；杭州聚焦大模型和开源社区建设，给予高额研发补贴——这些都是在未来产业“播种”。武汉也应着眼于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未来赛道，提前进行资本布局，用今天的投入撬动明天的产业变革。

## 做强三大特色：构筑区域金融中心的“四梁八柱”

依托自身优势，武汉应在三大特色领域集中发力。

一是聚焦科技创新，打造辐射全国的科技金融中心。科技与金融的融合，是武汉最大的优势所在。首先，要围绕“一城三廊”科创布局，打造具有武汉辨识度的科技金融阵地。其次，要推动国有平台转型，打造“政府投资银行”。引导传统基建平台转向产业投资和风险投资，做大做强科创基金矩阵，让国有资本成为引领科技创新的“领头羊”。同时，要优化制度环境，借鉴北京、苏州等地经验，健全线上线下服务平台，打造“科创金融广交会”和线上的“科创金融淘宝网”。

二是借力“中碳登”，建设全国碳金融中心。作为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系统（中碳登）的所在地，武汉手握绿色金融的“王牌”。当前，应大力发展碳债券、碳保险等创新产品，构建全覆盖的碳金融产业体系。三是激活数据要素，打造以数据为锚的新型金融枢纽。信息时代，数据是最关键的生产要素。武汉应围绕数据要素，加快建设国家级数据中心、算力中心，成立国家级数据交易所，推动数据要素流通。更重要的是，要围绕数据、算力、算法等核心领域，引育一批平台枢纽企业，构建由数据驱动、平台支撑、网络协同的新经济系统。

## 前瞻未来布局：打造未来城市资产运营枢纽

现代科技正在重塑城市空间架构，未来城市的生产生活方式将发生深刻变革，这为武汉创新发挥金融功能提供了新机遇。一方面，要打造未来资产运营枢纽。围绕支撑未来空间结构和生产生活方式的资产，发展未来空间和未来资产的开发性金融。重点支持金融机构和企业加大在未来城市、虚拟空间等核心资产的投融资，推动形成未来的产业空间和利润增长空间。

另一方面，要打造未来资产运营枢纽。着力引育人工智能、数字空间运营等领域的关键平台企业，主导运营虚拟与现实相融合的未来城市复合空间。通过它们实现数字空间下的全球资源配置，建设数字货币、虚拟金融服务等交易中心，培育未来复合空间下的价值生成体系。

（作者单位为武汉市社会科学院）

# 工匠精神是英雄精神的日常表达

冯华

武汉的英雄气概，往往在危急关头充分表达。但在日常生活中，英雄精神表现为更日常、更沉潜的力量，表现之一便是渗透在钢筋水泥里、镌刻在车床零件上、流淌在街巷烟火中的工匠精神。

近代以来，武汉之所以能成为“百万平津门，直道沪上”的全国第二大经济中心，靠的不仅是开埠的通商之利，更是早期工匠对技术参数的那股“锱铢必较”的劲头。这种对标准近乎偏执的追求，本质上正是武汉人“不服输”精神在工业领域的理性表达：不满足于现状，不妥协于平庸，用硬指标扛起实业救国的重担。

新中国成立后，这种精神得到了延续与放大。“一五”期间，武钢、武重、武船等“武字头”企业拔地而起。那一代工匠，如马学礼、吴运铎们，用“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的敬业精神，将个人的技艺融入国家工业化的洪流。每一道焊缝的严丝合缝，每一颗铆钉的精准落位，每一座工程的拔地而起，都在为武汉的英雄气质注入工业时代的理性基因。

工匠精神并非孤立的品质，它在武汉的城市发展中，呈现出多维的价值面向，与城市精神互为表里。它是精益求精的 professionalism，工匠精神的核心是对极致的追求。武船集团的王中华扎根焊接岗位数十年，能让焊缝平整如镜；长飞光纤的研发团队，创下“一根光纤拉出7公里不断”的世界纪录；全国劳模陈汉龙修复三峡水轮机组核心部件，精度控制在0.02毫米以内。

它同时也是敢为人先的创新锐气，工匠精神意味着从不墨守成规。改革开放初期，汉正街的匠人们既严守“货真价实”的古训，又最早引入流水线与品牌概念，成为个体经济的摇篮。新时代的光彩，这种创新气质愈发鲜明。长江存储的3D NAND闪存团队，历经数千次试验实现技术领跑；众多科技工作者在芯片、激光等领域向“卡脖子”技术持续发起冲击。“老手艺”与“新做法”结合，武汉始终保持着求变求新的锐气。

站在全力打造“五个中心”的新起点上，弘扬工匠精神，绝非一句口号，而是推动城市能级提升的现实需要。在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的过程中，工匠精神不仅体现为个体的技艺精湛，更体现为产业链条上的紧密协同。这种协同能力，让武汉在激烈的产业竞争中既能抵御风险，又能提升效率。

工匠精神无疑是文化软实力的“硬支撑”，当“技能光荣”成为社会共识，当精益求精成为一种城市风尚，武汉的城市精神就不再是抽象的口号，而转化为每个市民的日常实践。

（作者单位为中共武汉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

# 以『枢纽』逻辑打造区域金融中心

陈进 范妮娜

## 青马在线

# 女性进步不是为了压倒男性

王丽童

次深刻的解放，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文明的进步。

然而，权利的平等并非一蹴而就。尽管法律上的男女平等原则早已确立，但隐性的性别偏见仍在社会生活中客观存在，如职场中的晋升障碍、婚育对职业发展的影响、家庭分工中的不平衡负担等，这些都持续构成对女性发展的现实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在讨论这些现实问题时，舆论场上出现了一种值得警惕的倾向：在谈及争取女性正当的权益诉求时，将男性预设为天然的“对立面”。这种叙事偏离了问题的本质。从世界范围看，女权运动的历史演进，本质上是一场关于“人”的解放运动。从19世纪争取平等选举权，到20世纪推动社会文化变革，再到21世纪关注多元性别议题，其核心逻辑一以贯之，女性寻求的，从来不是对另一性别的“压制”或“取代”，而是自身作为“人”的基本权利的回归。将结构性的社会问题简化为两性间的零和博弈，既无助于消除偏见，反而会加深误解与隔阂。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正如马克思所言：“任何一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女性从依附走向独立，挑战的并非男性本身，而是那些僵化的、将人分类禁锢并赋

予不同价值的旧制度和旧观念。真正的平等不是“谁压倒谁”，而是共同从旧观念的枷锁中解脱出来。

从更深层次看，女性解放的进程，同样在为整个社会“松绑”。女性从单一的“家庭角色”中走出，男性也得以从“养家糊口”的沉重负担中释放。当家庭照料被重新认识其社会价值，当育儿责任被倡导共同分担，所有人都可能获得更完整、更自由的发展空间。这条路，是女性通往解放的路，亦是全人类通向文明深处的必由之路。

这正是女性解放超越性别本身的意义所在。它不是一场权力争夺，而是一场人性的复归。它不是让女性成为“像男性一样的人”，而是让每一个人，无论男女，都能摆脱刻板印象的束缚，成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这一进程，改变的不仅是女性的命运，更是整个社会运行的方式、人与人关系的本质。

实现这一愿景，既需要每一位女性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各自领域实现自我价值；更需要全社会凝聚共识，以更完善的制度消除隐性歧视，以更温暖的文化搭建平等平台，让尊重差异、包容多元成为共同行动。

（作者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镌刻着20世纪初全球劳动妇女为争取权益而斗争的记忆。在中国，自20世纪20年代起，这一节日便与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紧密相连，见证了广大妇女发挥“半边天”作用、投身国家发展洪流的历程。

今天，当我们谈论女性权利、女性发展时，其本质究竟指向何方？厘清这一问题，不仅关乎对节日本身的理解，更关乎我们如何认识正在发生的社会变革。理解女性地位的变迁，必须将其置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结构演变的宏观背景中考察。

在传统社会中，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男耕女织”的生产模式与宗法礼教的双重作用，使女性长期处于依附于男性的从属地位。早期两性分工源于生理差异，但随着私有制的出现和父权制的确立，这种分工被制度化 and 价值化。男性因掌控主要生产资料、主导公共领域活动而获得社会主导权，女性的家庭劳动则被边缘化，甚至被视为“无偿”的附属。同时，封建“礼教”和“妇德”等伦理规范将这种分工内化为一种理所当然的性别秩序，最终沉淀为根深蒂固的社会模式。

真正的历史性转折，始于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教育的推进。当生产活动突破家庭藩篱，当经济收入不再仅仅依附于土地和宗族，女性获得了以独立个体身份参与社会劳动、竞争资源的机会。这一经济基础的深刻变革，从根本上动摇了延续千年的性别分工逻辑。在中国，伴随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广大妇女在法律上获得平等地位，广泛投身社会生产，实现了从“家庭中”向“社会中”的历史跨越。这是一